

初探「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之間的關係（2000～2017）*

薛 健 吾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摘要

隨著中國對外投資的能力日益增加，中國透過投資（特別是透過「一帶一路」的各種項目）在各國創造出「債務陷阱」的說法也喧囂而上。然而，相關文獻對於中國是否在各國創造出「債務陷阱」的意見莫衷一是，而且迄今也尚未有大樣本的經驗資料來系統性地探討這個問題。據此，本文的目的，就是根據最新可得的債務資料以及對於「債務陷阱」作更精確的定義，來探討來自中國的投資是否系統性地與「債務陷阱」現象的出現有顯著的關聯性。來自全球 180 個國家從 2000～2017 年這段期間的資料顯示，中國的投資占 GDP 的比率愈高的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占其 GDP 的比率愈高，償還中國貸款的能力愈低，並且在外交政策的利益上更接近中國的立場，也與中國在互動上有著更低比率的衝突與更高比率的合作。這些經驗證據在以「國家」為單位的分析單位上支持了「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但由於缺乏跨國跨時的資料，這些國家在因果關係上到底是因為先具有這些特質所以才得到中國的投資與貸款（並非中國有意為之的「債務陷阱」現象），還是因為先得到中國的投資與貸款所以才展現出這些特質（與中國可能有關的「債務陷阱」現象），就有待未來更多可得的跨國跨時資料才能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註* 本文的初稿曾在 2022 年 11 月 25 日發表於「『巨變中國：二十大與中共的再集權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為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作者感謝評論人賴潤瑤老師的寶貴建議，以及期刊的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委老師們的專業修改意見。文中若有錯誤之處，皆為作者本人之責任。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經驗資料以及 STATA 工作流程，歡迎隨時以 e-mail 向作者聯絡索取。

關鍵詞：一帶一路、中國投資、債務陷阱、還款能力

* * *

壹、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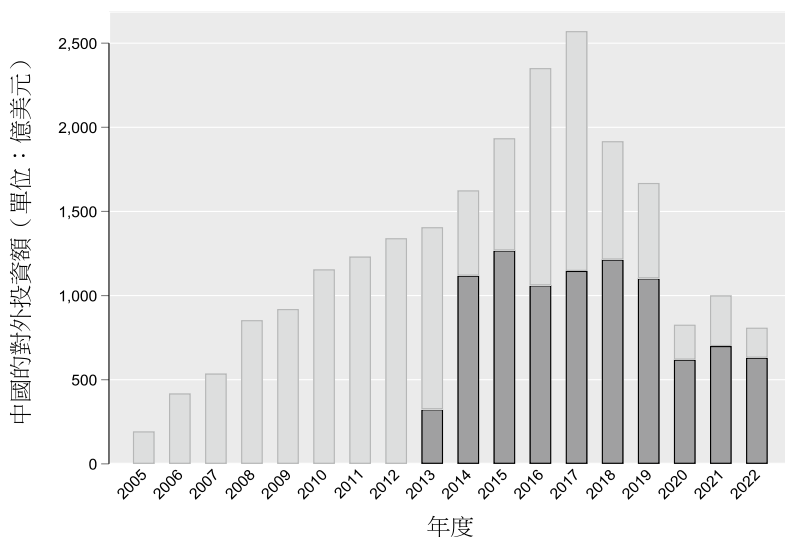
從 2013 年 10 月中國開始宣布「一帶一路」的計畫以來，迄今（至 2022 年結束）已經推動了完整的 9 個年頭。根據美國著名的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的統計，累積至 2022 年結束為止，中國已經對外投資了超過 9,262 億美元，至少已經有 115 個國家與中國合作「一帶一路」的投資與建設項目（AEI 2023），並且有 140 個國家已經與中國簽訂了「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中國本身也已經在 2017 年的「十九大」時把「一帶一路」的建設寫進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在中國的大力推動之下，至少在 2020 年「新冠肺炎」（COVID-19）的疫情發生之前，中國的「一帶一路」每年都是以超過 1,000 億美金以上的規模持續對外投資，成為這十年來國際政治經濟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隨著中國對「一帶一路」的大力推動，各種爭議的聲音也不斷地出現，最大的爭議主要來自於西方民主國家對於「一帶一路」對於參與國所可能帶來的政治影響的質疑。在各界的分析中，「一帶一路」最大的爭議點主要有三：第一是認為「一帶一路」將重塑地緣政治的版圖，讓參與國更可能加入中國的陣營來與西方民主國家對抗；第二是認為「一帶一路」的資金挹注將賦予非民主國家的統治集團更多的資源來鎮壓或是攏絡反對勢力，使參與國的貪腐情況更加嚴重或者是更難出現民主化的可能；第三是認為「一帶一路」中的某些先由中方借錢給參與國的投資與建設項目已經達到參與國的經濟能力所無法償還的規模，造成參與國陷入「債務陷阱」（debt trap），意指中國有意使各國積欠中國鉅額的貸款，而各國為了償還這些積欠中國的鉅額貸款，只好把境內的關鍵設施、天然資源、重要戰略地點交給中國管理，或是在各種內、外政策上更加配合中國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事實上早在「一帶一路」於 2013 年正式推動之前，在改革開放 20 餘年以來的快速經濟成長下，中國早在 2000 年的初期就有能力對外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同樣根據「美國企業研究院」的統計，自 2005 年以來至今（至 2022 年結束為止），中國在那些不是以「一帶一路」為名的各種項目上，也已經對外投資

了超過 1 兆 6,147 億美元（AEI 2023）；此外，從 2018 年之後，中國也把許多早在「一帶一路」推出之前就已經在各國長期投資的項目也都納入了「一帶一路」的名義之下（參見下面的圖 1）。因此，若要了解「中國的資金」對於相關國家的影響，我們不應侷限在是否以「一帶一路」為名的那些項目之中。

圖 1 中國歷年的對外投資額，2005～2022 年



說明：淺色長條為中國所有的對外投資額，淺色長條其中的深色長條部分，是中國以「一帶一路」為名義的對外投資額。

資料來源：AEI（2023）。

不論是來自中國或是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資金，他們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注資主要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型態（Dreher et al. 2018; Dreher et al. 2022, 27）：第一種是以「官方的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形式出現，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官方對 ODA 的定義，ODA 的資金是由提供資金的國家提供優惠的條件、在整個計畫之中至少有 25% 的投資是屬於純粹補助的項目，並且以促進被投資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福祉為主要目的的注資，這種資金一般又稱為「外援」（aid）；第二種是以「其他官方的資金流動」（Other Official Flows, OOF）的形式出現，OECD 對於 OOF 的定義是那些純粹補助的項目占整個計畫的

25% 以下、而且並不是以促進被投資國的經濟發展與人民福祉為主要目標的注資，這一類的資金比較接近一般的商業投資，是以追求更高的投資報酬率的獲利為目的，這種資金一般又稱為「信貸」（credit）或是「外債」（debt）。

根據相關研究的發現，中國的資金與西方國家的資金主要有兩個不同之處。第一個不同之處是兩者在「援助」和「貸款」上的比率的不同。Dreher 等人（2022, 5）指出，從 2000～2014 年的這段期間，中國官方對外投放的資金只有 23% 是屬於「援助」的部分，而在同樣一段時間中，西方國家官方對外投放的資金屬於「援助」的部分則超過了 90%；Malik 等人（2021）也發現，自從中國開始進行「一帶一路」的計畫之後，中國對外投注的資金在「貸款」和「援助」上的比率快速地提高到 9:1，也就是說，「一帶一路」的投資主要是以「貸款」的方式來進行，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與各國在各種「一帶一路」項目上的合作共建，而當地主國的資金不足時就由中國先以「貸款」的方式來提供，這也是使地主國在與中國進行「一帶一路」的合作之後會出現債務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個不同之處是兩者在執程序上的不同。相對於西方國家的資金通常需要由地主國正式提案、須交由國際組織或是西方國家的國會進行審議、附帶各種要求地主國改善透明度的條件、要求由地主國的正式政府機構來接受撥款和定時回報執行情況等等繁文縟節的條件，對於資金有緊急需求的開發中國家自然更加傾向於向中國尋求資金支持；而中國資金的標準作業流程是由開發中國家的政治領袖（而不是由技術官僚或是其他政府部門）直接提出要求，這些要求通常會在中國經由「適當的」審查程序快速通過，而且也因為中國方面並不會對於地主國的社會評估或是環境評估有特別的要求，再加上中國的資金往往要求由中國的企業來執行因而減少了與地主國的企業溝通所需的時間，因此中國資金的投資計畫往往能夠很快地就在地主國開始執行（Dreher et al. 2022, 22-24）。Dreher 等人（2022）認為，將「貸款」和「援助」這兩個初始目的不同的資金對地主國所帶來的效果混為一談，是造成誤解中國與西方資金可能有著不同效果的主因之一，他們發現，事實上中國資金與西方資金對於開發中國家所帶來的目的和效果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以「援助」為名的資金主要是想要在地主國促進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以「貸款」為名的資金主要是想要在地主國追求商業上的投資報酬率。但麻煩的地方在於，有別於西方國家主要是由「私人企業」來在地主國運用這些資金，中國的企業基本上是「國有企業」，可由中國政府官方直接控制實際的運作，因此使得中國資金的政治影響更為複雜也更受矚目（Dreher et al. 2022, 6-7; Pearson et al. 2022）。

對於中國投資在「地緣政治」和「民主退化」上的相關爭議，由於相關資料

的可得性較高，因此相關的討論和經驗研究也較為豐富（Naím 2007；Dreher et al. 2018；Zeng 2021；Biglaiser and Lu 2022；Ping et al. 2022；Raess et al. 2022；薛健吾 2020; 2022）。然而，在「債務陷阱」爭議的部分，由於國家債務的資料相對不透明，也較為難以取得，因此過去的研究較少對此有直接的探討，此外，相關文獻也並未區分出「積欠債務」與「陷入債務陷阱」兩者之間的不同。據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試圖根據最新可得的債務資料以及對於「債務陷阱」作更為精確的定義，以探討來自中國的投資是否系統性地與「債務陷阱」現象的出現有顯著的關聯性。本文發現，來自全球 180 個國家在 2000～2017 年這一段期間的資料顯示，中國的累積投資額占該國的 GDP 的比率愈高的國家，該國積欠中國的債務占其 GDP 的比率愈高，該國償還中國貸款的能力愈低，並且該國在外交政策的利益上更接近中國的立場，也與中國在互動上有著更低比率的衝突行為與更高比率的合作行為。也就是說，「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的現象這兩者之間確實具有顯著的關聯性。但由於缺乏跨國跨時的資料，這些國家在因果關係上到底是因為先具有這些特質所以才得到中國的投資與貸款（並非中國有意為之的「債務陷阱」現象），還是因為先得到中國的投資與貸款所以才展現出這些特質（與中國可能有關的「債務陷阱」現象），就有待未來更多可得的跨國跨時資料才能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本文的內容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在這邊第一節的緒論之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之間的關係為何。其後，本文在第二節的文獻回顧中討論「是否有『債務陷阱』存在的相關爭議」，以及「各國落入『債務陷阱』的可能原因」，並據此對於「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之間的關係建立更為精準的假設。接著，本文在第三節檢證這些假設是否能夠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持。最後的第四節是結論以及對本文的研究限制的特別說明。

貳、文獻探討

關於「來自中國的投資」與「陷入債務陷阱」之間的關係，相關的討論主要是在兩個方面有著明顯的爭議：第一個方面是關於是否有「債務陷阱」的存在，相關研究有的認為「來自中國的投資」確實造成了「債務陷阱」的出現，而有的則認為「債務陷阱」並非普遍的系統性現象，而是僅僅只有少數國家可能落入了「債務陷阱」；第二個方面是關於是什麼原因造成債務陷阱，相關研究有的認為「債務陷阱」明顯是因為中國的投資所造成，但中國到底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為之」

則是另一個問題，而有的則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自己「先天不良」的問題，因此無論如何這些國家都將債臺高築，而這與「來自中國的投資」本身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以下本文一一分析這些不同的觀點。

一、關於是否真的有「債務陷阱」的出現

（一）認為「確實存在『系統性債務陷阱』」之相關看法

第一個相關爭議是到底是否有「債務陷阱」的出現，關於「一帶一路」的參與國是否有陷入「債務陷阱」的現象，過去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至少從 2017 年開始，西方的主流媒體每年都有新聞不斷地報導，許多國家在參與了「一帶一路」之後，已經陷入了中國的「債務陷阱」（Xu and Li 2020, 70-72），這個「債務陷阱」的問題，也被許多重要的意見領袖和政治人物不斷地在公開場合中多次強調。據信，最早讓「中國的債務陷阱」這個論述浮上國際輿論檯面的，是印度學者 Brahma Chellaney 在 2017 年 1 月 23 日在「Project Syndicate」這個網路媒體中所刊出的一篇以「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China's Debt-Trap Diplomacy）為名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中國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和拉賈帕克薩國際機場（Mattala Rajapaksa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一帶一路」建設項目幾近停擺的同時，中國仍然繼續給予斯里蘭卡政府更多的資金和貸款來從事其他基礎建設，而斯里蘭卡政府也以各種政治讓步來作為對中國的回報（Chellaney 2017）。就在該文刊出的同年年底，2017 年 12 月，斯里蘭卡由於無力償還積欠中國的債務，遂將漢班托塔港移交給中國管理 99 年（Stacey 2017），這個事件似乎更坐實了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確有其事的論述，也使得「債務陷阱」成為後續各界在評估「一帶一路」的影響時常常會被提及的問題。^①

在前述 Chellaney 的文章登出以後，許多西方媒體、分析家，甚至是政府官員，也開始討論到這個「債務陷阱」的現象。例如，Hurley、Morrisg 和 Portelance（2018）的分析指出，「一帶一路」至少使巴基斯坦、吉布地、馬爾地夫、寮國、蒙古、塔吉克、吉爾吉斯，以及蒙特內哥羅等 8 國在未來無法順利償還積欠中國的鉅額貸款；美國前副總統 Mike Pence 在 2018 年 11 月 17 日出席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領袖會議時，也公開批評中國的「一

註① 類似的情形還有吉布地將吉布地港（Port de Djibouti）以每年 2,000 萬美元的特許權使用費將航行權全權交給中國，希臘將比雷埃夫斯港（Port of Piraeus）51% 的股份出售給中國的公司，以及澳洲將達爾文港（Port Darwin）出租給中國 99 年等等（Shaikh and Chen 2021, 6）。

帶一路」，指稱中國基礎建設的貸款不透明，將使各國承擔債務並且陷入困境，並公開呼籲各國不要接受任何可能會損及主權的外債（Tarabay and Choe 2018）；專門研究中國對外經略的機構「維吉尼亞威廉瑪麗學院 AidData」（AidData — A Research Lab at William & Mary）的執行董事 Brad Parks，在接受《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的訪問時也指出，中國「一帶一路」的貸款已在各國創造出至少 3,850 億美元不會顯示在國家負債表上面的「隱性債務」，而且中國其實更偏好以各國境內的那些可以「拿了就走」的資產來做為主要的抵押品，較少要求當地國以「定點的各種設施」來作償還，因此也使外界難以直接觀察到如漢班托塔港那樣的現象（Kuo 2021）。Cabestan（2012）和 Addis 等人（2021）對中國在伊索比亞的投資的研究也發現，不論中國的動機如何，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的特色極其明顯，伊索比亞除了積欠中國大筆債務難以償還之外，也在各種外交政策上積極配合中國的立場，例如支持中國的「反分裂法」和拒絕譴責中國的人權爭議等等。除了上述例子之外，對於中國「債務陷阱」的報導也經常見於各個西方主流媒體之中。明顯可見，西方主流媒體普遍認為，中國的投資已經使許多開發中國家陷入了對中國的「債務陷阱」。

（二）認為「並不存在『系統性債務陷阱』」之相關看法

與此同時，亦有研究發現，在參與「一帶一路」之後出現「債務陷阱」的國家不僅為數不多，而且很多還是不實的指控；甚者，中國在一些國家的貸款其實是無法回收獲利的，而且也沒有證據表明中國對這些收不回貸款的國家擁有明顯的政治影響力。例如，Ferchen（2018）發現，中國對委內瑞拉的貸款不僅因為委內瑞拉的內亂而無法收回，中國也無法對委內瑞拉施加政治影響；Sautman 和 Yan（2019）分析了斯里蘭卡的債務情況以及漢班托塔港的發展情形，認為並沒有所謂「中國債務陷阱」（Chinese debt trap）的存在；Kratz、Feng 和 Wright（2019）回顧了與中國重新進行外債談判的 40 個案例後發現，因為欠債而被中國沒收資產的情況是非常罕見的，反而是債務國在與中國的債務談判之後往往還能獲得中國延長貸款期限和再融資，最常見的談判結果，其實是這些國家還能被中國免除部分或是全部的債務，中國在談判中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反而非常有限。

Xu 和 Li（2020）指出，中國「債務陷阱」的相關論述主要集中在「中國刻意寬鬆放貸以增加地主國的負債」、「中國的貸款具有政治目的」、「中國的貸款是以汲取地主國的天然資源而不是以促進地主國的經濟發展為目的」以及「中國是地主國債務危機的主要製造者」等四個主要論點上，但是他們認為，這四個論點基本

上都不是普遍的事實，理由有四：（1）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地主國迫切需要中國的基礎建設資金與經驗而主動向中國提出貸款的要求；（2）中國的資金多以尋求長期的經濟獲益為目的，甚少對地主國提出政治上的要求；（3）地主國出售資源來交易中國的基礎建設，事實上有助於當地的經濟發展；（4）更重要的是，中國並不是這些國家唯一的債務國，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貸款和全球化的進展，與這些國家債務危機的出現有著更為直接的關聯性。Acker、Brautigam 和 Huang（2020）分析 2000～2019 年中國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債務減免與再重組的情況後發現，沒有一個國家出現資產被中國沒收的情況，也沒有出現被法院強制執行還債或是被中國要求給付懲罰性的高利率的情況，然而因為整個債務再協商的過程實在是太不透明，因此給予外界「債務陷阱是中國所刻意造成」的疑慮。薛健吾（2020）分析有參與「一帶一路」和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兩組國家，發現兩者在總體外債的積累與變動上的情況並無顯著的差異，此外，2013～2017 年的數據也顯示，僅有少數參與國（馬爾地夫、蒙古、吉布地、吉爾吉斯和寮國等 5 個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有明顯的增長。

Brautigam（2020）針對安哥拉、吉布地、斯里蘭卡和委內瑞拉四國的個案研究也顯示，在這些國家裡面普遍被指控陷入中國「債務陷阱」的項目之中，陷入債務困境的原因往往與中國沒有直接的關係，而是來自於其他在他們參與「一帶一路」之前就早已發生的理由。^② Brautigam（2019a）在之前也曾指出，中國對外放貸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在於製造「債務陷阱」，而是在於其不透明度所帶來的「任人唯親和收取回扣」的治理問題。Singh（2021）研究中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資行為後發現，中國的貸款並非這些國家出現債務問題的主因，中國也並未掠奪債務國的戰略資產或是天然資源或是對其進行軍事擴張，更重要的是，對於那些被隔絕在美國和美國的西方盟國之外的開發中國家來說，中國的資金提供了他們另一種選擇的機會。Gulati 和 Babu（2022）對非洲國家的分析顯示，非洲並未出現對中國的債務陷阱，前十大非洲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總額僅有 1,092 億美元，且其中有 40% 是來自於安哥拉這一個單一國家對中國的負債。Himmer 和 Rod（2022）分析中國的「一帶一路」是否對斯里蘭卡、馬爾地夫、馬來西亞、寮國、肯亞、吉布地等 6 個重要參與國帶來「債務陷阱」的現象，並且發現，雖然中國在明知各國的償還能

註② 後續 Carmody（2020）對前述 Brautigam（2020）的回應則是認為，雖然「債務陷阱」的指控確實言過其實，但中國確實透過經營創造出這些國家對於中國的「依賴性」，而這些「依賴性」自然就有成為中國可使用的政策槓桿的可能。

力有問題的情況之下還是願意對他們大幅放款，但卻難以找到中國有刻意藉此獲得各國重要戰略資產的行為，反之，中國往往會主動給與各國延遲償還或是豁免債務的優惠，而且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都是參與國的政治領袖主動向中國提出貸款的要求，而不是中國主動為之的行為。

總和來看，在學術的研究中，目前尚未有足夠的實證證據去支持中國的投資確實是使各國陷入「債務陷阱」的主要理由。

（三）中國自己的說法

最後，中國方面自然也是極力否認其有造成各國陷入「債務陷阱」的問題。例如，2022 年 8 月 18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例行的記者會上，針對記者提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非期間提到的「中國債務陷阱」的問題，表達了五點回應：第一，以債務比率來看，私人企業和西方國家才是這些積欠外債最多的國家的主要債權人；第二，西方國家自己發布的報告也顯示，近年來這些國家快速增加的外債主要是來自西方國家以及西方的企業和國際組織；第三，這些國家債務的主要還款對象也是西方國家以及西方的企業和國際組織；第四，西方債權人給這些國家的還款利率遠比中國所要求的利率要高出許多；第五，西方債權人以維護自身的信用評等為理由，甚少像中國那樣主動去減免這些國家的債務（文匯網 2022）。再例如，2022 年 8 月 26 日，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歐盟使團」的官方網站上登出〈所謂中國的債務陷阱只是一個敘事的陷阱〉（*The So-called China's Debt Trap Is A Narrative Trap*）專文，特別提出五點聲明：第一，有債務不等於有「債務陷阱」；第二，中國並不是這些欠債國最大的債權人；第三，開發中國家非常重視與中國的合作；第四，中國的對外融資有效幫助了當地國的經濟發展；第五，中國已幫助許多開發中國家減輕負債。其在文末並指出，西方媒體所說的「欠我（西方）的債是投資，欠你（中國）的債是陷阱」，是一個典型的雙重標準和敘事陷阱（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歐盟使團 2022）。2023 年 10 月 10 日，中國國務院發布《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說明「一帶一路」推動十年以來的成果，當中直稱，中國「遵循國際慣例和債務可持續原則，不斷完善長期、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投融資體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因為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而陷入債務危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3）。^③ 中

註③ 即便如此，該白皮書中亦明白地指出，「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分別設立『一帶一路』專項貸款，集中資源加大對共建『一帶一路』的融資支持。截至 2022 年底，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已直接為 1,300 多個『一帶一路』項目提供了優質金融服務，有效發揮了開發性金融引領、匯聚境內外各

國官方在各種公開聲明中持續強調，中國方面不僅沒有刻意製造「債務陷阱」，而且往往還會主動減免各國積欠中國的債務，以達成互利共贏，不斷地透過各種公開聲明來否定中國造成「債務陷阱」的說法。

二、關於是什麼原因造成國家陷入「債務陷阱」

第二個相關爭議是，如果真的有國家陷入了所謂的「債務陷阱」，那麼又是什麼原因造成他們陷入「債務陷阱」的呢？對此，相關文獻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為，所謂的「債務陷阱」，除了確實是由於中國的投資所造成的之外，也是中國「有意為之」的舉措。這類觀點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或是其他的投資就是直接造成各國陷入「債務陷阱」的原因，中國透過有預謀的借貸使各種投資項目在各國開展，先讓各種相關計畫開始進行，進而使各國為了完成計畫而繼續向中國貸款，使各國積欠中國的債務愈積愈多，最後使各國為了獲得更多的資金或是更優惠的償還條件而只好配合中國的各種政策要求。這個觀點也是西方主流媒體的主流觀點，充斥於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和政策分析之中。而在學術的研究上，也至少有兩份研究支持了這個西方的主流觀點：Horn 等人（2020）研究中國從 1949 年以來到 2017 年的對 152 國的放款（loans）和補助（grants）行為之後也發現，中國大約有一半的對外放款和補助是沒有向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申報的，因此也扭曲了過去對於中國資金的政策監管、風險報酬和債務可持續性的各種研究結果。Gelpern 等人（2021）研究 24 個開發中國家的政府與中國的國有企業所簽訂的 100 個合約後發現：第一，這些合約大多數都附有保密條款，禁止債務國向外界透漏與中國的貸款額度、償還條件，甚至有些還禁止債務國對外透漏有向中國借貸的事實；第二，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放貸經常要求各種擔保條件或是透過由中國直接控管的帳戶來進行，避免借貸國對債務進行各種形式的重組；第三，中國在放貸合約中所要求的各種取消債務、加速償還債務或是穩定債務的條款，使中國擁有影響各債務國的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潛在能力，且即便這些秘密條款事實上因為不合法所以不一定能

類資金共同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融資先導作用；中國進出口銀行『一帶一路』貸款餘額達 2.2 萬億元，覆蓋超過 130 個共建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3），也就是說，中國官方的白皮書明白地指出，參與國對「一帶一路」的主要債權人「中國進出口銀行」所欠下的未償還貸款餘額已達到了約 3,100 億美元，若將其除以中國官方所統計的 130 多個參與國，則每個國家的平均債務亦達到了約 24 億美元之譜（張雅涵 2023）。

夠得到法律的支持，也已經讓債務國失去管理債務危機的能力，亦使債務國與中國的債務再協商變得非常複雜。

第二種看法認為，雖然所謂的「債務陷阱」很可能確實是由中國的投資所造成，但卻不一定是中國「有意為之」的行為，而是因為其他更為複雜的發展過程所演變而來的結果。這類觀點也有的認為，事實上許多參與中國「一帶一路」的國家其本身非常歡迎中國的投資和建設，也樂於與向中國融資和共建，只是計畫實施之後的結果或者是大環境的變化與當初所預期的不相符，因而產生積欠中國債務的結果，難以歸咎於是中國單方面刻意為之的行為，而這一點又以大型的基礎建設工程為最。例如，被西方媒體認為是典型「債務陷阱」範例的斯里蘭卡，可能就是這樣的例子。在 1983～2009 年，斯里蘭卡政府和要求在斯里蘭卡的北部和東部獨立建國的「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lam, LTTE）爆發內戰，政府軍在 2009 年 5 月擊斃 LTTE 的領袖，在內戰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當時的斯里蘭卡總統 Mahinda Rajapaksa 選擇了強硬的軍事鎮壓而非與 LTTE 進行真正的和平協商來結束內戰，造成許多人權問題和戰爭罪行的爭議，使得他受到西方國家的譴責。在內戰結束之後，Rajapaksa 極需鉅額資金來快速重建斯里蘭卡的經濟以鞏固其統治基礎，在拒絕聯合國的調查而無法在短期之內得到西方國家足夠金援的情況之下，Rajapaksa 政府快速地倒向願意伸出援手又不對金援附帶政治條件的中國（Behuria 2018; Dreher et al. 2022, 9-14）。在 2006～2014 年的這段期間，斯里蘭卡與中國在聯合國大國中投票的相似程度竟達到了 99%（Dreher et al. 2022, 13），但實際上，在這段期間，斯里蘭卡仍然繼續向國際貸款。Gangte（2020, 59）指出，截至 2017 年時，斯里蘭卡所積欠的外債事實上只有約 10% 是積欠中國的債務，其他 90% 的外債其實是積欠給國際外債市場（39%）、亞洲發展銀行（14%）、日本（12%）、世界銀行（11%）、印度（3%）以及其他國家（11%），而且在中國對斯里蘭卡所投資的項目事實上超過 3,000 個，但卻只有漢班托塔港這一個單一項目能夠被拿出來作為負面的例子（Brautigam 2019b; Gangte 2020, 55）。

第三種看法認為，造成「債務陷阱」或是其他政治或是社會問題的最主要原因，與中國的投資就不那麼直接相關，而大多是出自於各國自己本身的問題，這些國家由於本身的政治經濟情況不佳，所以不論他們向任何一個國家或是國際組織借款，都會因為本身的治理不佳而出現「債務陷阱」或是其他政治或是社會問題；另外，也有觀點認為，有些建設事實上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來說太過重要，因此中國其實也不想讓這些建設成為「債務陷阱」；甚至還有觀點認為，中國的對外融資體系太過於破碎和分散，因此難以協調一致地去共同追求中國的戰略利益，反

而是那些被投資的開發中國家的政府之中的各種政治經濟利益衝突決定了「一帶一路」項目的本質（Jones and Hameiri 2020, 2）。例如，Shaikh 和 Chen（2021）對於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 Port）和「中巴經濟走廊」（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等「一帶一路」項目的研究就指出，債務問題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巴基斯坦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不佳而導致工程延誤所引起，事實上巴基斯坦的國內基於發展經濟的考量是極為重視這些建設的，而中國方面也因為巴基斯坦在經濟和地緣政治安全上的重要性而極力避免對巴基斯坦的債務施加壓力；Naseer 等人（2022）認為，由於巴基斯坦原本的兩個商港都已經接近滿載（Kanwal 2018），因此瓜達爾港對於幫助巴基斯坦的對外連結以促進經濟發展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但印度和美國對於債務陷阱的過度宣傳，反而阻礙了該建設正常的發展，使「債務陷阱」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但事實上巴基斯坦難以償還的債務大多是積欠給 IMF，而且中國提供的貸款利率不僅較 IMF 為低，而且也比 IMF 給予更多的債務豁免；Dreher 等人（2022, 7, 9-24, 192-246, 247-281）對於斯里蘭卡和坦尚尼亞兩國的個案研究以及對於全球國家的統計分析都發現，中國的資金對被投資國所帶來的效果事實上與西方國家的資金的效果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地主國在接受資金之後是否能夠得到經濟上的發展、是否會惡化政府的貪腐問題、是否會使當地的自然環境遭受破壞、是否會使當地人民產生對於中國的反感，以及是否會增加地主國政府和反對勢力之間的暴力衝突，主要仍然是要取決於地主國自己的政治經濟情況。

三、文獻中的不足之處與本文的可能貢獻

從前面的討論中可以看出，文獻中的討論對於「『債務陷阱』是否確有其事」，以及「『債務陷阱』是否是由中國所刻意造成」的這兩個問題，有著正反並陳的看法。從上述各種對於「是什麼原因造成國家陷入『債務陷阱』」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文獻中至少有「中國有意為之」、「中國無意為之」、「因為該國本身的問題所以不論是向中國或是其他國家貸款都會發生」等三種不同的觀點。本文認為，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要先確定的前提條件是，「來自中國的投資」與「『債務陷阱』的現象」兩者之間至少要先有顯著的關聯性，然後才能繼續探討這個「債務陷阱」的現象是否確實是中國有意為之的問題。據此，本文希望對於相關文獻所提供的新貢獻，即在於透過最新可得的資料來檢視所謂的「債務陷阱」是否確實是一個系統性地存在於各個與中國有投資和借貸關係的國家的普遍現象，還是

僅存在於少數與中國有投資和借貸關係的國家的特殊例外。^④ 本文認為，造成這些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過去的相關研究至少有以下三個地方有待進一步的釐清，而本研究在這三個地方都有可繼續推進之處。

第一個有待釐清的地方是，過去對於「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關係的研究，大多是來自於針對少數國家的個案研究，真正大樣本的系統性研究其實尚未出現。也就是說，第一個有待釐清的地方是在於文獻中所討論的案例國家是否具有足夠的代表性，這些經常被提及的國家（如斯里蘭卡和吉布地等等）是否能夠普遍代表中國投資的系統性影響，還是只是樣本中的極端值，這個問題只有透過對於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廣泛比較才能釐清。

第二個有待釐清的地方也與前述第一個有待釐清的地方有關，那就是，中國的投資可能在「同一個國家」之中的「不同地區」和「不同項目」帶來不同的結果，而且中國「以援助為目的」或是「以借貸為目的」所投資的資金也可能有著不同的影響。例如，中國同樣都是在斯里蘭卡或者是在某一個特定國家的投資，可能在某些項目或是地區上進展順利，而且已經對當地帶來了經濟發展或者是提供了當地在未來發展經濟的潛力，但在另一些項目或是地區上，卻可能在當地造成爭議或是帶來了債務或是貪汙的反效果。再例如，Dreher 等人（2022, 192-246, 247-281）大樣本的實證研究也發現，中國的投資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所帶來的影響可以是天差地別，特別是當研究者沒有去區分「以援助為目的」的項目或是「以借貸為目的」的項目時更是如此。因此，對於中國抱持正、反不同態度的分析家，自然都可以在其論述中選擇性地去將某一些特定的結果報導出來，刻意去宣揚中國投資的正面效果或是負面效果，所以，如果不把分析的單位聚焦於「國家整體」，那麼這個爭議就永遠都不會消失。據此，本文的分析以「國家整體的情況」（state）為分析單位，而不以「特定的投資項目」（items/projects）為分析單位，有助於進一步釐清這個文獻中的爭議。

第三個有待釐清的地方則是在於對「債務陷阱」的定義不清楚的問題。相關文獻幾乎把「只要積欠中國大量債務」或是「只要有在某方面對於中國出現疑似讓步的行為」，就直接把這個現象與「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畫上等號。但實際上：第一，積欠中國大量債務的國家，並不一定會比沒有積欠中國大量債務的國家更容易

註④ 也就是說，本文要探討的問題是「『債務陷阱』是否是一個系統性的普遍現象，還是一個僅存在於少數國家的特殊例外」，本文並不否認中國的投資在某些國家或是某些特定的項目中還是有「債務陷阱」出現的可能性，唯本文的目的並非在指出哪些國家的哪些項目是屬於後者。

出現對中國讓步的行為，正如同在實際的金融市場運作中我們可以看到的一種普遍現象一樣，債權人為了確保債務人的償還可能，往往會答應債務人許多進一步的要求，以求維持債務人的償還能力，出現類似債權人反而被債務人綁架的情況，例如「一帶一路」在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的進展，很可能就是這種情形的展現（薛健吾 2019）；第二，許多疑似「政策讓步」的行為，也有可能是令雙方都感到滿意的一種「政策交易」，如此一來就與「讓步」或是「屈服」完全不相關，而是一次令雙方都感到滿意的「交易」行為，如此一來就與「債務陷阱」無涉，如需款孔急的吉布地選擇讓中國以支付權利金的方式來全權使用吉布地港，亦可說是一種正常的契約行為；^⑤ 第三，最重要的是，積欠中國大量債務，並不能直接代表該國就無力償還，而且往往還是愈具有償還能力或是經濟前景愈被看好的國家，愈有可能得到債權人更多的貸款，此外，「一帶一路」的許多項目的執行方式是中國與參與國的合作共建，而當參與國的資金不足時，就先由中國對其提供「貸款」，但這些項目在建成之後，對參與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可能是有益的，從上述這兩個情況來看，「積欠巨額債務」的情況，反而是一種正面的指標。^⑥ 從這三個理由明顯可見，過去文獻對於「債務陷阱」的定義明顯沒有將上述三種不同的情形納入考量，因此而對這個問題造成了爭議。

本文認為，根據文獻中的精神，真正的「債務陷阱」應該要符合三個條件：第一，該國必須至少要先有積欠中國大量債務的事實，這個基本條件應無疑義；第二，該國必須缺乏足夠的還款能力，否則即便積欠再多的貸款也難以認定其造成該國難以償還的負擔；最後的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於，該國必須出現在政策上更加配合中國的行為，^⑦ 否則，若該國與中國的關係沒有明顯地改變，原本就與

註⑤ 這種情況其實還有一種較為陰謀論的可能，有分析家指出，中國其實是有意給予某些「一帶一路」合作國家超過其償還能力的貸款，刻意使其在帳面上陷入鉅額債務，然後再由中國官方去「豁免」這些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如此除了可以營造中國正面的國家形象之外，更重要的是，由於這些被地主國積欠工程款的承包商絕大多數其實還是中國的國有企業（此亦為引發地主國當地民衆反感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國官方「豁免」債務的這個動作，實際上就是在「洗錢」，透過這種方式來把錢轉進某些特定的中國企業的口袋。當然，以學術研究要求證據的標準來說，這是一個幾乎無法被實證資料證實的說法。

註⑥ 例如美國的國債，根據美國官方所公布的數據，在 2022 年結束時，美國的國債已經累積至 31 兆 4,200 億美元，超過其 2022 年 GDP 的 130% 以上（Amadeo 2023），這個數字事實上完全不亞於所謂陷入「債務陷阱」的國家積欠中國債務的比率，但顯然市場一般不會認為美國有無法償還的問題，因為美國明顯具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支持其國債。

註⑦ 雖然在大多數的分析中對於「債務陷阱」的定義是「把境內的關鍵設施、天然資源、重要戰略地點交給中國管理，或是在各種內、外政策上更加配合中國利益」，但是，若以前半句「把境內的關鍵

中國有衝突的議題仍然還是處在衝突之中，那我們頂多只能說該國有積欠中國債務，不能說該國陷入了中國的債務「陷阱」。據此，要探究「中國投資」是否系統性地（而非只是在少數幾個特定國家）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債務陷阱」，以下四個假設應該要同時能夠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持：

假設一（關於中國投資是否與各國積欠中國債務的程度有關）：中國的投資占經濟體的比率愈高的國家，其積欠中國的債務占經濟體的比率愈高。

假設二（關於中國投資是否減低了各國的償還能力）：中國的投資占經濟體的比率愈高的國家，其未來還款的能力愈低。

假設三（關於各國積欠中國債務的程度是否與各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利益相似程度有關）：積欠中國的債務占經濟體的比率愈高的國家，在外交政策利益上與中國的相似程度愈高。

假設四（關於各國積欠中國債務的程度是否與各國與中國的衝突與合作關係有關）：積欠中國的債務占經濟體的比率愈高的國家，與中國之間發生衝突的比率愈少、從事合作的比率愈高。

在下一節中，本文將透過經驗證據與研究設計來檢證這四個假設是否確實能夠同時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持。如果這四個假設都未能或是只有部分能夠得到經驗證據的支持，那麼我們至少在證據上就難以同意「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之間具有系統性的關聯性的說法；反之，如果這四個假設都得到了經驗證據的支持，那麼「『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有關」的說法就在經驗證據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成爲一個值得持續關注的現象。

設施、天然資源、重要戰略地點交給中國管理」來定義「債務陷阱」，則在定義上將會出現至少兩種爭議。第一，在相關分析中，事實上只有極其少數的國家（例如斯里蘭卡和吉布地）有被提及是有「把境內的關鍵設施、天然資源、重要戰略地點交給中國管理」的例子，而且很多重要資源和設施其實是由中國「付費」使用，在客觀上與正常的契約關係難以區別，甚難將其定義爲是「陷阱」，所以如果要去把每一個有把境內的設施交給中國付費使用的國家和情況都要定義爲是「陷阱」的話，基本上就變成完全贊同某一支文獻的觀點，而失去了本文想要客觀分析的目的。第二，以此方式來定義「債務陷阱」會產生的另一個問題是，基本上幾乎在每一個有與中國合作開採礦產或是將某些設施租用給中國的國家，都能符合「債務陷阱」的定義，而且中國往往與各國都有超過數十個項目以上的合作，其中一定有某些少數項目是屬於這種情況，所以若要用這種方式來編碼「債務陷阱」，那麼幾乎每一個中國有投資的國家都會被編碼爲有出現「債務陷阱」，這樣子不僅在依變數上沒有變化，而且也有過度定義的問題。基於這兩個理由，本文將分析的重點放在定義的後半句「是否在各種內、外政策上更加配合中國利益」上，俾利更加客觀和具有可否證性地來探討這個問題。

參、研究設計

一、依變數與統計模型

（一）依變數一：積欠中國的債務占該國GDP的比率

衡量各國是否陷入「債務陷阱」的第一個重要指標，自然就是該國到底積欠了中國多少的債務。本文採用「AidData 資料庫」（Malik et al. 2021, 158-165）所估計的各國從 2000～2017 年這段期間累積積欠中國的各種債務占各國在 2017 年時的 GDP 的比率來作為第一個依變數。各國積欠中國的債務由「主權債務」（由政府官方直接向中國借貸或是由政府官方出面擔保的債務）和「隱性債務」（由國有銀行、國有企業、或是其他具有官方性質的機構所積欠，且政府可能具有償還義務的債務）這兩個部分所組成，並由該資料庫的研究員根據各方可得的資料在彙整後進行推估。下面的表 1 是先以每 10% 為一個等級的排序列出積欠中國的債務占本身在 2017 年時的 GDP 的比率最高的國家，目的是先提供讀者一個大概的資訊，讓讀者了解各國積欠中國債務的大致情況，關於各國積欠中國的債務占 GDP 的比率，以及哪些國家有被納入本文的統計模型之中的問題，更詳細的資訊可參見本文最後的「附錄」。^⑧

（二）依變數二：該國對積欠中國的債務的還款能力

衡量各國是否陷入「債務陷阱」的另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其是否能夠維持其償還債務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長期以來都能持續穩定地展現其償還債務的能力，那麼不論該國欠了多少錢，都難以認為其陷入了「債務陷阱」，而要保持償還債務的能力，該國的經濟是否能夠持續增長就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本文以「該國累積積欠中國的債務占該國在 2017 年時的 GDP 的比率」是「該國在這 18 年以來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的多少倍數，來衡量該國對於中國債務的償還能力，該國積欠中國的債務占 GDP 的比率占其平均經濟成長率的倍數愈少，則該國愈具有償還欠中債務的能力，愈沒有陷入中國「債務陷阱」的疑慮；反之，該國積欠中國的債務占 GDP

註⑧ 目前全世界約有 190 多個國家和政治實體，本文分析了其中的 180 個國家，其餘 10 幾個國家和地區並未納入本文樣本的主要理由在於，這些國家可能由於地位特殊（科索沃、臺灣）、規模太小（列支敦斯登、摩納哥、聖馬利諾、安道爾）、國家能力不足（帛琉、馬紹爾群島、諾魯、吐瓦魯）、對外封閉（北韓、古巴），或是在這段期間曾經處在中央政府能力不足的狀態（委內瑞拉、阿富汗），因此缺乏足夠的統計資訊可供分析。在相關的文獻中，這些國家也是經常未被納入分析的國家。

的比率占其平均經濟成長率的倍數愈多，則該國愈不具有償還欠中債務的能力，愈有可能陷入中國的「債務陷阱」。各國平均經濟成長率的資料來源為 World Bank（2022）。

表 1 各國累積積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在 2017 年時的 GDP 的比率

累積積欠中國的債務 占其在 2017 年時的 GDP 的比率	國家數	國家
無負債紀錄	79 國	
0.1～10% GDP	67 國	斐濟、烏干達、中非共和國、巴基斯坦、俄國、阿曼、查德、波札那、格瑞那達、模里西斯、迦納、越南、貝南、玻利維亞、馬利、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賴索托、馬拉威、坦尚尼亞、幾內亞、巴貝多、蓋亞那、象牙海岸、古巴、葛摩、孟加拉、盧安達、馬來西亞、葉門、蒲隆地、千里達及托巴哥、埃及、南非、印尼、奈及利亞、巴西、烏克蘭、馬達加斯加、甘比亞、阿根廷、利比亞、宏都拉斯、尼泊爾、亞塞拜然、哥斯大黎加、賴比瑞亞、巴哈馬、幾內亞比索、摩洛哥、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突尼西亞、菲律賓、敘利亞、土耳其、亞美尼亞、塞席爾、智利、烏拉圭、祕魯、巴拉圭、巴拿馬、約旦、黎巴嫩、羅馬尼亞、阿爾及利亞、摩爾多瓦
11～20% GDP	28 國	獅子山、安地卡及巴布達、柬埔寨、蒙特內哥羅、蒙古、哈薩克、剛果民主共和國、巴布亞紐幾內亞、厄利垂亞、伊索比亞、厄瓜多、白俄羅斯、南蘇丹、納米比亞、加彭、喀麥隆、多米尼克、汶萊、伊朗、多哥、緬甸、斯里蘭卡、烏茲別克、牙買加、尼日、茅利塔尼亞、肯亞、塞內加爾
21～30% GDP	7 國	薩摩亞、蘇丹、塔吉克、土庫曼、萬那杜、委內瑞拉、辛巴威
31～40% GDP	5 國	東加、吉爾吉斯、尚比亞、莫三比克、蘇利南
41～50% GDP	4 國	赤道幾內亞、安哥拉、吉布地、馬爾地夫
51～60% GDP	1 國	剛果
61～70% GDP	1 國	寮國

資料來源：Malik et al.（2021, 158-164）。

（三）依變數三：該國與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相似程度

衡量各國是否陷入「債務陷阱」的第三個重要指標，就是積欠中國大量債務的國家是否因此而在外交政策上更加接近中國的立場。在相關文獻中，各國與中國在聯合國大會（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中的投票模式的相似程度最經常被使用來作為各國與中國外交政策立場相似程度的測量（Strüver 2016），其中又以 Bailey 等人（2017）所估計出的「各國與中國之間在外交政策理想點上的距離有多遠」的資料為最經常被使用的指標（Johnston 2019, 15-17；薛健吾 2020, 19-28; 2022, 131-139）。本文也使用 Bailey 等人（2017）的理想點資料來估計各國與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相似程度，計算出在 2000～2017 年的這段期間各國與中國在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的平均值，這個數值大致介於 0（該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立場完全相同）到 6（該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立場完全相反）之間，數值愈大代表該國與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相似程度差異愈大。

（四）依變數四：該國與中國的衝突與合作關係

衡量各國是否陷入「債務陷阱」的最後一個重要指標，就是該國是否因此而在各種內、外政策上更加配合中國，而如果這個現象為真，則我們應該可以觀察到該國與中國之間有著更多的合作與更少的衝突。本文採用美國哈佛大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the 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所開發的大數據資料庫「整合危機早期預警系統」（Integrated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 ICEWS）（ICEWS 2023）中所紀錄的由全球各大語言的媒體所報導出來的各國與中國之間的互動資料，來計算出各國與中國在 2000～2017 年的這段期間的每一年被媒體所報導出來的各種衝突與合作事件的次數占雙方總互動次數的百分比的平均值，這個數字理論上可介於 0%（該國與中國的所有互動皆為合作／衝突）到 100% 之間（該國與中國的所有互動皆為衝突／合作）。

（五）統計模型的選擇

在統計模型的選擇上，一來，本文所使用的變數的資料皆為 2000～2017 年時的累積值或是平均值，並無跨國跨時資料（panel data）需要控制時間相關性（temporal dependence）與空間相關性（spatial dependence）的問題；二來，本文的資料數較少，極端值的影響可能較大。在這兩個考量下，本文採用「穩健迴歸」的統計模型來進行分析，該模型的原理是，相較於假定每個觀察值的權重相等的「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穩健迴歸」是先將資料使用 OLS 模型分析一遍，然後計算出每一個觀察值對模型殘差值的影響，然後在

屏除那些對模型的殘差值影響較大的樣本（Cook's distance > 1）之後再重新分析一次統計模型，以減少極端值對結果的影響。

二、其他解釋變數與控制變數

爲了釐清本文的主要變數之間的關係是否容易受到其他解釋變數或是控制變數的影響，本文也將那些在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債的文獻中經常被認爲是重要影響因素的變數放入模型之中。由於本文的依變數是各國在 2000～2017 年的這段期間所累積的中國的投資與負債，因此本文的其他解釋變數與控制變數同樣也都是取其在 2000～2017 年這段期間的「平均數」，亦即各國在這一段期間平均來說是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狀況，藉此來看是哪一種類型的國家更容易受到中國的影響。

（一）該國的民主程度

本文採用著名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公布的「自由分數」（freedom score）來測量各國的民主程度。「自由分數」是以各國在「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這兩個面向上的各種指標的表現來測量各國的自由程度，其公布的原始分數是介於 2 分（最自由）到 7 分（最不自由）之間。爲了便利運算，本文採取在文獻中普遍採用的方法，將各國的自由分數以 2 到 14 分的方法來表示，得分愈高的國家民主的程度愈高。

（二）該國的發展程度

本文採用大多數文獻測量各國發展程度的方式，以該國的人均 GDP 來測量該國的發展程度，該國的人均 GDP 愈高，發展程度就愈高。由於各國的人均 GDP 有極大的差異，因此與文獻中的習慣相同，本文將其取自然對數以使資料更爲符合常態分配。各國人均 GDP 的資料來源爲 World Bank（2022）。

（三）該國的政治穩定程度

在投資和外債研究的文獻中，普遍會控制該國是否有出現政變（coup d'état）或是內戰（civil war）等等可能會對依變數帶來重大影響的政治不穩定因素，故本文也將該國政治的穩定程度納入考量。本文採用 World Bank 的「全球治理指標」（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資料庫中的「政治穩定與免於暴力和恐怖主義」（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指標來測量各國的政治穩定程度，根據該資料庫的定義，該指標測量的是在各種政治勢力的對立之下，民衆對於政府是否會被來自於政治暴力或是恐怖主義等非制度性的程序或是暴

力手段造成不穩定或是被推翻的可能性的感受，若民衆對於這些事情的感受愈正面，則該國的「政治穩定」分數就愈高，各國「政治穩定」分數的變化範圍大致介於－3（政治的穩定程度最低）～3（政治的穩定程度最高）之間（Kaufmann et al. 2011）。

（四）該國的貪腐治理程度

一個國家的貪腐程度可能也會影響到其對於外資的利用方式，故本文也將其納入考量。本文採用前述 World Bank 的「全球治理指標」資料庫中的「貪腐控管」（Control of Corruption）指標來測量各國的貪腐治理程度，各國「貪腐控管」分數的變化範圍大致介於－3（貪腐的程度最高）～3（貪腐的程度最低）之間（Kaufmann et al. 2011）。

（五）該國與中國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相似程度

該國與中國之間的利益相似關係可能也會對其與中國之間的投資與借貸關係產生影響，例如中國有可能更經常地減免與之在外交政策的利益關係上較為接近的國家的負債等等，因此本文以在相關文獻中經常被使用的該國在聯合國大會中與中國之間投票模式的差異程度來測量該國與中國在外交政策立場上的差異程度，也就是前述由 Bailey 等人（2017）所估計出的各國與中國之間在外交政策理想點上的距離有多遠的數值。這個數值大致介於 0（該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立場完全相同）到 6（該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立場完全相反）之間。

（六）中國對該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該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依賴關係可能也會對其與中國之間的投資與借貸關係產生影響，本文以中國與該國的貿易額占中國 GDP 的比率來測量中國貿易依賴該國的程度，這個比率愈高，則中國貿易依賴該國的程度就愈高。中國與各國的貿易額與 GDP 的資料來源分別為 The United Nations（2023）和 World Bank（2022）。

（七）該國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程度

本文以該國與中國的貿易額占該國 GDP 的比率來測量該國貿易依賴中國的程度，這個比率愈高，則該國貿易依賴中國的程度就愈高。各國與中國的貿易額與 GDP 的資料來源分別為 The United Nations（2023）和 World Bank（2022）。

（八）該國對中國以外的國家的貿易依賴程度

除了該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依賴關係之外，該國與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之間的

貿易和投資、借貸關係都可能對其與中國之間的投資與借貸關係產生影響，本文以該國與中國以外的國家的貿易額占 GDP 的比率來測量該國與中國以外國家的貿易依賴程度，這個數值愈高，則該國對中國以外的國家的貿易依賴程度就愈高。資料來源為 Penn World Table 10.0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5)。

（九）該國對中國以外的國家的外資依賴程度

本文以該國收到的來自中國以外的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額占 GDP 的比率來測量該國對中國以外的國家的外資依賴程度，這個數值愈高，則該國對中國以外的外資依賴程度就愈高 (World Bank 2022)。

（十）該國的原油出口額占GDP的比率

由於不少文獻都發現中國對於產油國家的經營特別積極（例如 Lee 2019），因此本文也一併將這個因素納入探討。本文以該國的原油出口額占 GDP 的比率來計算該國是多重要的產油國，這個數值愈高則重要性愈高 (World Bank 2022)。

（十一）該國是否為說英語的國家

由於有文獻發現中國比較容易打入可以使用英語來溝通的國家，而且英語媒體所報導出來的中國對其他國家的投資與借貸事件也比較容易被大眾給注意到，所以也更可能被收錄在各個資料庫中，因此本文與相關文獻的處理方式相同 (Dreher et al. 2018, 187)，也一併將「該國是否為說英語的國家」這個因素納入考量與控制。這個變數是一個二元變數 (dummy variable)，若該國為說英語的國家則編碼為 1，若否即編碼為 0。

三、統計分析

下面的「表 2」為本文所使用到的變數的敘述統計，「表 3」到「表 6」分別檢證本文的四個假設，每一個表格的第一個模型先呈現不放入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的結果，第二個模型則是呈現放入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之後的結果。

表 2 本文所使用到的變數的敘述統計（各國 2000~2017 年的平均數）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自變數 / 依變數]					
積欠中國的債務占該國 2017 年 GDP 的比率	180	6.81	11.66	0.00	64.80
中國的總投資額占該國 2017 年 GDP 的比率	180	13.02	27.89	0.00	252.92
該國對積欠中國的債務的還款能力	180	2.31	5.83	-2.96	54.28
[其他解釋變數或控制變數]					
平均民主程度	180	9.28	3.79	2.00	14.00
平均人均 GDP（取對數）	180	8.45	1.42	5.73	11.55
平均政治穩定程度	180	-0.08	0.92	-2.69	1.44
平均貪腐程度	180	-0.06	0.98	-1.60	2.34
平均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180	0.75	0.66	0.13	3.37
平均被中國貿易依賴的程度	180	0.21	0.71	0.00	6.60
平均貿易依賴中國的程度	180	6.72	9.60	0.41	68.44
平均與中國以外國家的貿易依賴程度	180	80.35	46.63	-9.43	348.24
平均與中國以外國家的外資依賴程度	180	-7.20	29.19	-240.44	97.00
平均原油出口額占 GDP 的比率	180	4.34	10.02	0.00	48.96
是否為說英語的國家	180	0.39	0.49	0.00	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前文中所述之各項資料來源。

表 3 首先檢證「中國的投資額占該國 GDP 的比率」是否與「該國積欠中國的債務占 GDP 的比率」有顯著的關聯性，模型一和模型二顯示，不論是否放入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中國的投資額占 GDP 的比率愈高的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占 GDP 的比率也愈高，滿足了建立「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關聯性所需的第一個假設。

表 3 檢證「假設一」

[依變數] 積欠中國的債務占該國 GDP 的比率		
	模型一	模型二
[自變數]		
中國的總投資額占該國 GDP 的比率	0.557*** (0.009)	0.428*** (0.024)
[其他解釋因素或控制變數]		
平均民主程度		-0.312*** (0.092)
平均人均 GDP (取對數)		0.228 (0.315)
平均政治穩定程度		1.219*** (0.393)
平均貪腐程度		-1.231** (0.480)
平均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0.060 (0.416)
平均被中國貿易依賴的程度		-0.168 (0.312)
平均貿易依賴中國的程度		0.034 (0.023)
平均與中國以外國家的貿易依賴程度		-0.019*** (0.005)
平均與中國以外國家的外資依賴程度		0.012 (0.022)
平均原油出口額占 GDP 的比率		-0.100*** (0.028)
是否為說英語的國家		0.846* (0.453)
常數	-0.401* (0.223)	2.776 (2.565)
國家數	179	179

說明：(1) 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2) 顯著水準：*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文中所述之各項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4 檢證「假設二」

[依變數] 該國對積欠中國的債務的還款能力 (數值愈高代表還款能力愈低)		
	模型三	模型四
[自變數]		
中國的總投資額占該國 GDP 的比率	0.113*** (0.002)	0.075*** (0.006)
[其他解釋因素或控制變數]		
平均民主程度		-0.044* (0.024)
平均人均 GDP (取對數)		0.137* (0.082)
平均政治穩定程度		0.267** (0.103)
平均貪腐程度		-0.388*** (0.125)
平均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0.040 (0.108)
平均被中國貿易依賴的程度		-0.058 (0.081)
平均貿易依賴中國的程度		0.025*** (0.006)
平均與中國以外國家的貿易依賴程度		-0.003** (0.001)
平均與中國以外國家的外資依賴程度		-0.002 (0.006)
平均原油出口額占 GDP 的比率		-0.019** (0.007)
是否為說英語的國家		0.221* (0.118)
常數	-0.061 (0.055)	-0.429 (0.667)
國家數	179	180

說明：(1) 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2) 顯著水準：*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文中所述之各項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4 檢證「中國的投資額占該國 GDP 的比率」是否與「該國對積欠中國的債務的還款能力」有顯著的關聯性。模型三和模型四顯示，不論是否放入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中國的投資額占 GDP 的比率愈高的國家，該國對積欠中國的債務的還款能力也愈低，滿足了建立「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關聯性所需的第二個假設。

表 5 檢證「假設三」

[依變數] 該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模型五	模型六
[自變數]		
積欠中國的債務占該國 GDP 的比率	-0.007** (0.003)	0.002 (0.004)
[其他解釋因素或控制變數]		
平均民主程度		0.042** (0.017)
平均人均 GDP (取對數)		0.221*** (0.057)
平均政治穩定程度		-0.126 (0.077)
平均貪腐程度		0.070 (0.094)
平均被中國貿易依賴的程度		0.135** (0.058)
平均貿易依賴中國的程度		-0.003 (0.004)
平均與中國以外國家的貿易依賴程度		-0.001 (0.001)
平均與中國以外國家的外資依賴程度		0.002 (0.002)
平均原油出口額占 GDP 的比率		-0.011** (0.005)
是否為說英語的國家		-0.240*** (0.084)
常數	0.572*** (0.045)	-1.341*** (0.470)
國家數	180	180

說明：(1) 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2) 顯著水準：*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文中所述之各項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表 5 檢證「積欠中國的債務占 GDP 的比率」是否與「該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有顯著的關聯性。模型五顯示，在尚未放入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的時候，積欠中國愈多債務的國家，與中國在外交政策理想點上的距離也愈近，也就是說，積欠中國愈多債務的國家與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愈相近，這個部分滿足了建立「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關聯性所需的第三個假設。然而，模型六顯示，在放入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之後，這一個統計顯著性就消失了，表示這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比較不穩定，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可能對於該國與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相似程度上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例如民主程度愈高的國家、人均 GDP 愈高的國家、在貿易上愈被中國依賴的國家，與中國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相容性就愈低，而產油國家和說英語的國家（主要是那些中國在非洲與中南美洲的合作國家）與中國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相容性就愈高。

表 6 檢證「積欠中國的債務占 GDP 的比率」是否與「該國與中國之間的衝突與合作行為」有顯著的關聯性。模型七和模型八檢證與中國的合作，模型九和模型十檢證與中國的衝突。所有的模型都顯示，不論是否放入其他解釋變數和控制變數，積欠中國的債務占 GDP 的比率愈高的國家，在與中國的所有互動中都有著更高的合作比率和更低的衝突比率，^⑨ 也就是說，積欠中國的債務愈多的國家與中國之間有著更多的合作與更少的衝突，滿足了建立「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關聯性所需的第四個假設。

總和來說，在「表 3」到「表 6」的 10 個統計模型中，除了模型六在放入控制變數後「假設三」所預期的關聯性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之外，其他的 9 個模型的結果都能夠支持建立「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關聯性的四個假設。也就是說，接受愈多中國投資的國家，也是那些積欠中國債務愈多的國家，也是那些償還積欠中國的債務的還款能力愈差的國家，也是那些在外交政策上與中國利益的相似度愈高、同時也與中國有著更多的合作與更少的衝突的國家。從這個角度看來，「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之間的關聯性在經驗證據上確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註⑨ 由於合作與衝突的比率加起來為 100%，因此檢證合作的「模型七和模型八」和檢證衝突的「模型九和模型十」的統計結果會是對稱的，也就是說，兩組模型會出現各個變數的顯著性和係數都相同但是正負符號不同的結果，兩組模型的常數項相加起來也會是 100。

表 6 檢證「假設四」

	該國與中國合作的次數 占總互動次數的比率		該國與中國衝突的次數 占總互動次數的比率	
	模型七	模型八	模型九	模型十
[自變數]				
積欠中國的債務占該國 GDP 的比率	0.080*** (0.028)	0.074** (0.035)	-0.080*** (0.028)	-0.074** (0.035)
[其他解釋因素或控制變數]				
平均民主程度		0.020 (0.147)		-0.020 (0.147)
平均人均 GDP（取對數）		-0.169 (0.499)		0.169 (0.499)
平均政治穩定程度		1.601** (0.650)		-1.601** (0.650)
平均貪腐程度		-0.917 (0.791)		0.917 (0.791)
平均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		-0.763 (0.659)		0.763 (0.659)
平均被中國貿易依賴的程度		-1.257** (0.494)		1.257** (0.494)
平均貿易依賴中國的程度		0.015 (0.036)		-0.015 (0.036)
平均與中國以外國家的貿易依賴程度		0.004 (0.008)		-0.004 (0.008)
平均與中國以外國家的外資依賴程度		0.036*** (0.013)		-0.036*** (0.013)
平均原油出口額占 GDP 的比率		-0.023 (0.044)		0.023 (0.044)
是否為說英語的國家		-0.726 (0.719)		0.726 (0.719)
常數	94.629*** (0.375)	97.059*** (4.055)	5.371*** (0.375)	2.941 (4.055)
國家數	180	180	180	180

說明：(1) 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誤。

(2) 顯著水準：*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文中所述之各項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肆、結論

隨著中國對外投資的能力日益增加，中國透過投資（特別是透過「一帶一路」的各種項目）在各國創造出「債務陷阱」的說法也喧囂而上。然而，在相關的文獻中，對於中國是否在各國創造出「債務陷阱」的討論莫衷一是，而且迄今也尚未有大樣本的經驗資料來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性的探討。據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根據最新可得的債務資料以及對於「債務陷阱」作更為精確的定義，以探討來自中國的投資是否系統性地與「債務陷阱」現象的出現有顯著的關聯性。來自全球 180 個國家從 2000～2017 年這段期間的資料顯示，中國的投資占 GDP 的比率愈高的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占其 GDP 的比率愈高，償還中國貸款的能力愈低，並且在外交政策的利益上更接近中國的立場，也與中國在互動上有著更低比率的衝突與更高比率的合作。這些經驗證據在以「國家」為單位的分析單位上支持了「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最後必須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研究限制。雖然本文對經驗證據的檢證發現了「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兩者之間的關係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性，但本文在檢證上仍然有兩大研究限制，以目前可得的資料而言尚無法克服，故本文的發現僅為初探性的結果。受限於資料的可得性（目前各國積欠中國的債務尚未有可得的跨國跨時的 panel data），本文目前可以回答的問題是「『中國投資』與『債務陷阱』現象之間的關係是否是一個系統性的普遍現象」，而本文對這個問題的發現，可在未來對於進一步的問題（是否是中國有意為之）以及其他相關問題（例如中國在什麼情況之下、對哪一種國家會有意為之，又是哪一種國家更容易陷入「債務陷阱」）提供一份前導式的文獻，以作為後續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本文所面對的第一個重大研究限制，就是各國積欠中國和各國債務的資料相對不透明的事實。由於中國和各國的政府都不太有誘因去完整地公開這些資訊，再加上前述近年來中國試圖使用更為複雜的借貸方式來對各國進行貸款的事實，使得各國積欠中國的實際債務數字難以取得，故目前相關文獻都只能是以推估出來的數字來進行分析。

本文所面對的第二個重大研究限制亦與前述第一個研究限制有關，就是缺乏跨國跨時的 panel data 以供本文進行更進一步的因果關係上的檢證，這主要牽涉到的是「樣本選擇」上面的問題。有一個可能的疑慮是，願意接受中國的投資與債務的國家，或是中國願意去投資以及放款的國家，是否因為有其在先天上就具有某些

特殊的情況或是與中國之間就有著比較緊密的關係，因此才出現了「與中國的利益相似程度愈高、愈與中國有更多的合作和更少的衝突」的結果。^⑩ 誠然，在本文所分析的 180 個國家之中，有 144 個國家在這段期間有收到過來自中國的投資，有 112 個國家有積欠中國債務的紀錄，若觀察這 144 國和這 112 國可以發現，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非民主的開發中國家」，也就是說，擁有這些特質的國家，確實很可能是基於各種原因而與中國有著投資與借貸的關係。雖然正如大多數的文獻所指出的，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事實上是債務國的政治領袖主動向中國提出投資和貸款的需求，而不是由中國方面所主動提出，但由於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主要是各國在 2000～2017 年這 18 年間在「平均值」上面的關聯性，因此本文所能做出來的結論，僅限於回答「何種類型的國家相較於其他種類型的國家更可能出現『債務陷阱』的現象」的這樣一個跨國性差異（between-case variation）的問題，而無法回答「具體上是哪些因素的變化造成各國出現『債務陷阱』的現象」的這樣一個國內跨時性差異（within-case variation）的問題。也就是說，本文統計資料的分析單位是「國家」（state），然而，若要更加確立兩個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我們還需要「時間變化」的資訊，才能更加確定「中國投資」的變化確實與「債務陷阱」現象的變化有所關連，換句話說，更適當的分析單位應該是「國家一年度」（state-year），因此，本文的結論仍然不是決定性的。由於缺乏跨國跨時的資料，這些國家在因果關係上到底是因為先具有這些特質所以才得到中國的投資與貸款（並非中國有意為之的「債務陷阱」現象），還是因為先得到中國的投資與貸款所以才展現出這些特質（與中國可能有關的「債務陷阱」現象），就有待未來更多可得的跨國跨時資料才能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 * *

（收件：112 年 2 月 20 日，接受：112 年 8 月 1 日）

註⑩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都提醒本文應對於此點加以說明。

附錄 各國積欠中國的債務占GDP的比率 (累計至2017年)

國家	積欠中國的債務 占 GDP 的比率 (%)	是否被納入本文統計模型的樣本之中 (打 × 者為否)
寮國	64.8	
剛果	53.4	
赤道幾內亞	49.7	
安哥拉	49.5	
吉布地	48.5	
馬爾地夫	40.3	
東加	35.4	
蘇利南	34.0	
尚比亞	32.5	
吉爾吉斯	31.6	
莫三比克	31.5	
薩摩亞	29.9	
蘇丹	28.3	
塔吉克	27.0	
土庫曼	24.7	
萬那杜	22.5	
委內瑞拉	21.5	×
辛巴威	21.0	
獅子山	19.7	
安地卡及巴布達	19.7	
柬埔寨	19.7	
蒙特內哥羅	18.7	
蒙古	17.9	
哈薩克	17.5	

國家	積欠中國的債務 占 GDP 的比率（%）	是否被納入本文統計模型的樣本之中 （打 × 者為否）
剛果民主共和國	17.4	
巴布亞紐幾內亞	17.2	
厄利垂亞	16.9	
伊索比亞	15.5	
厄瓜多	15.4	
白俄羅斯	14.6	
南蘇丹	14.6	
納米比亞	14.5	
加彭	14.4	
喀麥隆	13.9	
多米尼克	13.7	
汶萊	13.5	
伊朗	13.5	
多哥	13.2	
緬甸	12.1	
斯里蘭卡	12.1	
烏茲別克	11.6	
牙買加	11.2	
尼日	11.2	
茅利塔尼亞	11.0	
肯亞	10.7	
塞內加爾	10.2	
斐濟	8.4	
烏干達	8.2	
中非共和國	8.0	
巴基斯坦	7.9	
俄國	7.6	

國家	積欠中國的債務 占 GDP 的比率 (%)	是否被納入本文統計模型的樣本之中 (打 × 者為否)
阿曼	7.6	
查德	7.4	
波札那	7.2	
格瑞那達	6.8	
模里西斯	6.5	
迦納	6.2	
越南	5.7	
貝南	5.7	
玻利維亞	5.5	
馬利	5.4	
波土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5.2	
賴索托	4.9	
馬拉威	4.9	
坦尚尼亞	4.8	
幾內亞	4.8	
巴貝多	4.6	
蓋亞那	4.6	
象牙海岸	4.6	
古巴	3.8	×
葛摩	3.1	
孟加拉	3	
盧安達	2.9	
馬來西亞	2.6	
葉門	2.5	
蒲隆地	2.3	
千里達及托巴哥	2.2	
埃及	2.1	

國家	積欠中國的債務 占 GDP 的比率（%）	是否被納入本文統計模型的樣本之中 （打 × 者為否）
南非	2.1	
印尼	2.0	
奈及利亞	1.7	
巴西	1.7	
烏克蘭	1.5	
馬達加斯加	1.4	
甘比亞	1.4	
阿根廷	1.3	
利比亞	1.3	
宏都拉斯	1.3	
尼泊爾	1.2	
亞塞拜然	1.1	
哥斯大黎加	1.0	
賴比瑞亞	1.0	
巴哈馬	1.0	
幾內亞比索	0.7	
摩洛哥	0.6	
阿爾巴尼亞	0.6	
保加利亞	0.6	
突尼西亞	0.5	
菲律賓	0.3	
敘利亞	0.3	
土耳其	0.3	
亞美尼亞	0.2	
塞席爾	0.2	
智利	0.2	
烏拉圭	0.2	

國家	積欠中國的債務 占 GDP 的比率 (%)	是否被納入本文統計模型的樣本之中 (打 × 者為否)
秘魯	0.1	
巴拉圭	0.1	
巴拿馬	0.1	
約旦	0.1	
黎巴嫩	0.1	
羅馬尼亞	0.1	
阿爾及利亞	0.1	
摩爾多瓦	0.1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0	
德國	0	
斯洛維尼亞	0	
多明尼加	0	
布吉納法索	0	
聖露西亞	0	
愛沙尼亞	0	
奧地利	0	
印度	0	
列支敦斯登	0	×
立陶宛	0	
挪威	0	
帛琉	0	×
摩納哥	0	×
盧森堡	0	
法國	0	
以色列	0	
海地	0	
賽普勒斯	0	

國家	積欠中國的債務 占 GDP 的比率（%）	是否被納入本文統計模型的樣本之中 （打 × 者為否）
英國	0	
匈牙利	0	
克羅埃西亞	0	
比利時	0	
冰島	0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0	
芬蘭	0	
貝里斯	0	
澳洲	0	
巴林	0	
義大利	0	
拉脫維亞	0	
瑞典	0	
美國	0	
伊拉克	0	
北馬其頓	0	
聖馬利諾	0	×
捷克	0	
東帝汶	0	
不丹	0	
薩爾瓦多	0	
瑞士	0	
南韓	0	
馬紹爾群島	0	×
哥倫比亞	0	
史瓦帝尼	0	
墨西哥	0	

國家	積欠中國的債務 占 GDP 的比率 (%)	是否被納入本文統計模型的樣本之中 (打 × 者為否)
沙烏地阿拉伯	0	
索馬利亞	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0	
馬爾他	0	
斯洛伐克	0	
荷蘭	0	
科索沃	0	×
吉里巴斯	0	
紐西蘭	0	
卡達	0	
科威特	0	
西班牙	0	
新加坡	0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0	
泰國	0	
葡萄牙	0	
丹麥	0	
塞爾維亞	0	
諾魯	0	×
瓜地馬拉	0	
吐瓦魯	0	×
聖多美普林西比	0	
維德角	0	
愛爾蘭	0	
波蘭	0	
北韓	0	×
阿富汗	0	×

國家	積欠中國的債務 占 GDP 的比率（%）	是否被納入本文統計模型的樣本之中 （打 × 者為否）
尼加拉瓜	0	
加拿大	0	
日本	0	
希臘	0	
喬治亞	0	
所羅門群島	0	
安道爾	0	×
臺灣	0	×

資料來源：Malik et al.（2021, 158-164）。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Investment” and the “Debt Trap” (2000~2017)

Chien-wu Alex Hsueh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s China's capacity to invest abroad expands, so does the concern that China may be pushing countries into “debt traps,” particularly through various projects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does not offer a consensus on whether China has indeed created “debt traps” in these countries. Moreover, large-scale empirical studies specifically addressing this issue have been notably absent. Hence,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nduct an initial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investment” and the concept of a “debt trap.” This will be based on the latest available debt data and a more precise definition of what constitutes a “debt trap.” The aim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is a systematic and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Chinese investment and the purported phenomenon of a “debt trap.” Drawing upon data from 180 countries worldwide spanning the years 2000 to 2017, it is evident that countries that have received greater Chinese investment tend to exhibit higher levels of debt owed to China, diminished debt repayment capacity, and closer alignment with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Additionally, they tend to experience lower rates of conflict and higher rates of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All of these empirical finding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is a substantial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investment” and the concept of a “debt trap” at the

state level of analysis. However, due to the absence of panel data, 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remains uncertain. Specifically,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se countries first exhibit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ubsequently receive investment and loans from China, leading to a “debt trap” phenomenon that is not intentionally caused by China. Conversely, it is possible that these countries receive investment and loans from China first, which subsequently results in them display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suggesting a “debt trap” phenomenon that may be associated with China. A more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causality awaits the availability of panel data in the future.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Investment, Debt Trap, Solvency

參考資料

- Brautigam, Deborah. 2019a. 〈「一帶一路」是債務陷阱外交嗎？〉,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0429/china-belt-road-initiative/zh-hant/>, 查閱時間：2019/4/29。
- Brautigam, Deborah. 2019a. “‘Yidai yilu’ shi zhaiwu xianjing waijiao ma?” [I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Debt Trap Diplomacy?]. (Accessed on April 29, 2019).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3, 〈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 <http://www.scio.gov.cn/gxzt/dtzt/49518/32678/index.html>, 查閱時間：2023/10/10。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3. “Gongjian ‘yidai yilu’: Goujian renlei mingyun gongtongti de zhongda shijian”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A Major Practice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ccessed on October 10, 2023).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歐盟使團, 2022, 〈The So-called China’s Debt Trap Is A Narrative Trap〉, http://eu.china-mission.gov.cn/eng/mh/202208/t20220826_10754334.htm, 查閱時間：2022/8/26。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European Union.
2022. “The So-called China’s Debt Trap Is A Narrative Trap” (Accessed on August 26, 2022).
- 文匯網, 2022, 〈中方駁斥「中國債務陷阱論」：美西方為轉嫁自身責任炮製的謊言〉,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8/18/AP62fe074fe4b033218a5de7d1.html>, 查閱時間：2022/8/18。Wenweipo. 2022. “Zhongfang bochi ‘zhongguo zhaiwu xianjinglun’: Meixifang wei zhuanjia zishen Zeren paozhi de huangyan” [China Refutes the “China Debt Trap Theory”: A Lie Conco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to Shift Its Own Responsibilities]. (Accessed on August 18, 2022).
- 張雅涵, 2023, 〈北京揭一帶一路白皮書, 專家：參與國債務被大幅低估〉,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82888>, 查閱時間：2023/10/10。Chang, Ya-han.
2023. “Beijing jie yidai yilu baipishu, Zhuanjia: Canyuguo zhaiwu be dafu digu” [Beijing Unveils Belt and Road White Paper Experts: Debt of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is Significantly Underestimated]. (Accessed on August 10, 2023).
- 薛健吾, 2019, 〈馬來西亞和巴基斯坦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再檢視〉, 《戰略安全研析》, 153：6-17。Hsueh, Chien-wu Alex. 2019. “Malaixiya he bajisitan dui ‘yidai yilu’ changyi de zaijianshi” [Malaysia and Pakistan Re-Examin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153: 6-17.
- 薛健吾, 2020, 〈中國「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的進展與影響, 2013～2018〉, 《遠

- 景基金會季刊》，21（2）：1-54。Hsueh, Chien-wu Alex. 2020. “Zhongguo ‘yidai yilu’ zai diyiye wunian de jinzhan yu yingxiang, 2013~2018” [The Progress and Impact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2013~2018]. *The Prospect Foundation*, 21 (2): 1-54.
- 薛健吾，2022，〈研究紀要：中國「一帶一路」的進展與影響，2013～2021〉，《中國大陸研究》，65（2）：117-157。Hsueh, Chien-wu Alex. 2022. “Yanjiu jiyao: Zhongguo ‘yidai yilu’ de jinzhan yu yingxiang, 2013~2021” [Research Note: Progress and Impac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13~2021].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5 (2): 117-157.
- Acker, Kevin, Deborah Brautigam, and Yufan Huang. 2020. *Debt Relief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rking Paper No. 2020/39*. Washington, DC.: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Addis, Amsalu K., Simplice Asongu, Zhu Zuping, Hailu Kendie Addis, and Eshetu Shifaw. 2021. “Chinese and Indian Investment in Ethiopia: Infrastructure for ‘Debt-Trap Diplomacy’ Exchange and the Land Grabbing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16 (6): 998-1025.
- Amadeo, Kimberly. 2023. “US National Debt by Year.” <https://www.thebalancemoney.com/national-debt-by-year-compared-to-gdp-and-major-events-3306287> (January 18, 2023).
- American Institute Enterprise (AEI). 2023.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January 18, 2023).
- Bailey, Michael A.,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2017.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2): 430-456.
- Behuria, Ashok K. 2018. “How Sri Lanka Walked into a Debt Trap, and the Way Out.” *Strategic Analysis*, 42 (2): 168-178.
- Biglaiser, Glen, and Kelan Lu Lilly. 2022. “Political Risk and Economic Sectors: Chinese Overseas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8 (3): 1-20.
- Brautigam, Deborah. 2019b. “Is China the World’s Loan Shark? Some Say Beijing Lends Money for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to Pressure Poor Countries with Debt. Not So.” <https://www.nytimes.com/2019/04/26/opinion/china-belt-road-initiative.html> (April 26, 2019).

- Brautigam, Deborah. 2020. "A Critical Look at Chinese 'Debt-Trap Diplomacy': The Rise of a Meme."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5 (1): 1-14.
- Cabestan, Jean-Pierre. 2012. "China and Ethiopia: Authoritarian Affinitie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China Perspectives*, 2012 (4): 53-62.
- Carmody, Pádraig. 2020. "Dependence Not Debt-Trap Diplomacy."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5 (1), 23-31.
- Chellaney, Brahma. 2017. "China's Debt-Trap Diplomacy."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one-belt-one-road-loans-debt-by-brahma-chellaney-2017-01?utm_term=&utm_campaign=&utm_source=adwords&utm_medium=ppc&hsa_acc=1220154768&hsa_cam=12374283753&hsa_grp=117511853986&hsa_ad=499567080219&hsa_src=g&hsa_tgt=aud-963711450884:dsa-19959388920&hsa_kw=&hsa_mt=&hsa_net=adwords&hsa_ver=3&gclid=Cj0KCQiAxbefBhDfARIsAL4XLRpUdASLk9F3-fsrqwGuuos4Eeo_5qawkG8Mp8oBP0VXG1Ax3MbACbYaAgvsEALw_wcB (January 23, 2017).
- Dreher, Axel, Andreas Fuchs, Brad Parks, Austin M. Strange, and Michael J. Tierney. 2018. "Apples and Dragon Fruits: The Determinants of Aid and Other Forms of State Financing from China to Af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2 (1): 182-194.
- Dreher, Axel, Andreas Fuchs, Bradley Parks, Austin Strange, and Michael J. Tierney. 2022. *Banking on Beijing: The Aims and Impacts of China's Overseas Development Program*.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enstra, Robert C.,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 2015.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 (10): 3150-3182.
- Ferchen, Matt. 2018. "China, Venezuela, and the Illusion of Debt-Trap Diplomacy."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8/16/china-venezuela-and-illusion-of-debt-trap-diplomacy-pub-77089> (August 16, 2018).
- Gangte, Lammuanisiam. 2020. "The Debt-Trap Diplomacy Revisited: A Case Study on Sri Lanka's Hambantota Port." *Artha-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9 (2): 53-66.
- Gelpern, Anna, Sebastian Horn, Scott Morris, Brad Parks, and Christoph Trebesch. 2021. "How China Lends: A Rare Look into 100 Debt Contract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https://www.cgdev.org/publication/how-china-lends-rare-look-into-100-debt-contracts-foreign-governments> (October 10, 2021).
- Gulati, Shreya, and Anand Babu. 2022. "The Chinese Debt Trap: A Myth or a Sinocentric World

- Order?” <https://blogs.lse.ac.uk/internationaldevelopment/2022/06/01/the-chinese-debt-trap-a-myth-or-a-sinocentric-world-order/> (June 1, 2022).
- Himmer, Michal, and Zdeněk Rod. 2022. “Chinese Debt Trap Diplomacy: Reality or Myth?”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18 (3): 250-272.
- Horn, Sebastian, Carmen M. Reinhart and Christoph Trebesch. 2020. “China’s Overseas Lending.”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050> (May, 2020).
- Hurley, John, Scott Morris, and Gailyn Portelance. 2018.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https://www.cgdev.org/publication/examining-debt-implications-belt-and-roadinitiative-policy-perspective> (March 4, 2018).
- Integrated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 (ICEWS) Dataverse. 2023.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verse/icews> (January 18, 2023).
- Jones, Lee, and Shahar Hameiri. 2020. *Debunking the Myth of ‘Debt-Trap Diplomacy’: How Recipient Countries Shape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ondon: Chatham Hous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Kanwal, Gurmeet. 2018. “Pakistan’s Gwadar Port: A New Naval Base in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in the Indo-Pacific.”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kistans-gwadar-port-new-naval-base-chinas-string-pearls-indo-pacific> (April 2, 2018).
- Kaufmann, Daniel, 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 2011.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 *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Law*, 3: 220-246.
- Kratz, Agatha, Allen Feng, and Logan Wright. 2019. “New Data on the ‘Debt Trap’ Question.” <https://rhg.com/research/new-data-on-the-debt-trap-question/> (April 19, 2019).
- Kuo, Mercy A. 2021. “China’s BRI Lending: \$385 Billion in ‘Hidden Debts’ Insights from Brad Parks.” <https://thediomat.com/2021/11/chinas-bri-lending-385-billion-in-hidden-debts/> (November 29, 2021).
- Lee, Chia-yi. 2019.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Do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vor Oil Producing Countr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5 (4): 570-588.
- Malik, Ammar A., Bradley Parks, Brooke Russell, et al. 2021. *Bank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sights from a New Global Dataset of 13,427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s*. Williamsburg, VA: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 Naím, Moisés. 2007. “Rogue Aid: What’s Wrong with the Foreign Aid Programs of China, Venezuela, and Saudi Arabia? They are Enormously Generous. and They are Toxic.”

- Foreign Policy*, 159 (March/April): 95-96.
- Naseer, Rizwan, Qiubin Wang, Ahmad Ali. 2022. "A Narrative of Debt Trap Vs Connectivity under CPEC: A Case of Gwadar Port." *South Asian Studies*, 37 (1): 141-158.
- Pearson, Margaret M., Meg Rithmire, and Kellee S. Tsai. 2022. "China's Party-State Capitalism and International Backlash: From Interdependence to In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7 (2): 135-176.
- Ping, Szu-Ning, Yi-Ting Wang, and Wen-Yang Chang. 2022. "The Effects of China's Development Projects on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1): 65-84.
- Raess, Damian, Wanlin Ren, and Patrick Wagner. 2022. "Hidden Strings Attached? Chinese (Commercially Oriented) Foreign Aid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lignmen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8 (3): 1-23.
- Sautman, Barry, and Hairong Yan. 2019. "The 'Chinese Debt Trap' and Its Sri Lanka Example." *Thought Leadership Brief*, 29: 1-4.
- Shaikh, Rizwan, and Chien-Kai Chen. 2021. "China's Debt Trap in Pakistan? A Case Study of the CPEC Project." *South Asia Research*, 41 (3): 1-16.
- Singh, Ajit. 2021. "The Myth of 'Debt-Trap Diplomacy' and Realitie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42 (2): 239-253.
- Stacey, Kiran. 2017. "China Signs 99-Year Lease on Sri Lanka's Hambantota Port Critics Denounce Move as an Erosion of Country's Sovereignty." <https://www.ft.com/content/e150ef0c-de37-11e7-a8a4-0a1e63a52f9c> (December 11, 2017).
- Strüver, Georg. 2016. "What Friends Are Made of: Bilateral Linkages and Domestic Drivers of Foreign Policy Alignment with Chin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2 (2): 170-191.
- Tarabay, Jamie, and Sang-Hun Choe. 2018. "Xi and Pence Stake Out Trade Positions in Dueling Speeches at Pacific Rim Forum." <https://www.nytimes.com/2018/11/17/world/australia/apec-china-trade-xi-jinping-mike-pence.html> (November, 17, 2018).
- The United Nations. 2023. "UN Comtrade Database." <https://comtradeplus.un.org/> (January 18, 2023).
- World Bank. 202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October 10, 2023).
- Xu, Shaomin, and Jiang Li. 2020. "The Emergence and Fallacy of 'China's Debt-Trap Diplomacy' Narrative."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81 (March/April): 69-84.

- Zeng, Yuleng. 2021. "Does Money Buy Friends? Evidence from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1 (1): 75-95.

